



房屋空間與生命政治：

以香港公營房屋為例

著——謝曉陽 澳門大學傳播系講師

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主編：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

房屋空間與生命政治: 以香港公營房屋為例

作者：謝曉陽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格局起變；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都市想像，追求不斷發展；新媒體盛行，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繼續衝擊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資本」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分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香港當前現況，對中國重申香港主權進行切要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6 謝曉陽.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謝曉陽。2016。「房屋空間與生命政治: 以香港公營房屋為例」。
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港社會文化系列》。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前言

1950年代「沒有家庭」的公營房屋

1960年代「打造家庭」的公營房屋

1970年代「全面治理」的公營房屋

結語

參考文獻

前言

管治者以公營房屋政策作為管治手段，把人口變成可供管治之物(governable object)，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部分歐洲國家已在管治技術上，透過各種統計數據將人口知識化，從而釐訂合乎其統治需要的房屋政策(Flamand，2001)。然而，這樣的管治思維(governmentality)及其權力操作往往要在不同時候，不同情況，作出不同調整。本文探討的課題就是，英國殖民者曾如何反覆調整公營房屋政策來配合他們的晚期香港政策，包括抵禦冷戰帶來的意外衝擊，確保其宗主國地位，延伸其「日不落帝國」餘暉。

在現有的香港公營房屋研究中，Smart(2006)曾指出，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大量難民及災民或因國內戰亂，或因逃避共產主義，持續湧入香港，迫使當時的殖民政府興建第一座徙置大廈來處理這些急增人口。是故，香港的公營房屋在當時僅是屬於救災工程，尚未屬於具有自身追求的房屋政策。到了1960年代，由於香港工業急遽發展，當時的公營屋房除了繼續發揮「安置」作用之外，還正如Castells & Kwok(1990)所言那般，已在官方的政治經濟計算中，變成維持香港內部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機制。香港的公營屋房也有好一段時期例必興建在工業區的周邊，成為配合工業發展的工

具。下及1970年代，雖然有論者提出這個年代才是有「真正房屋政策」(趙麗霞，2003：221-242)的開始，公營房屋終於以提供住所作為出現因由，可是這個年代也是殖民政府以公營房屋來進行「全面治理」(羅永生，2014：14-30)的開始，進一步成為了英國殖民者用來維持晚期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段。

若以傅柯的理論語言來說，利用公營房屋對人口進行全面管治，在理解上其實就是「生命政治」的一種(Foucault，2004；1976：175-211)。「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由傅柯自創出來的一個理論字眼(法文為Biopolitique)。「Bio」在其希臘原文的字意為「生命，生活的過程和方式」，所以「生命政治」所指的就是「攸關生活過程和方式的支配與角力」。傅柯指出，在運作方式上，生命政治的主要特點是要生活過程和方式變成可以控制的對象，透過知識/權力的介入，設計大量細微的管治技術，使得生活過程和方式合乎管治需要(同上)。為了增進認識，加深理解，本文將以「生命政治」為分析軸心，並以建築設計為分析重點，闡釋香港的公營房屋作為管治技術有何重大變化，特別是「家庭」作為私人生活的主要場地如何受到愈來愈精心設計的公共政策干預及控制。透過這樣的研究方式，本文嘗試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分析之外(余偉錦，1996；劉國裕，1996)，指出香港公營房屋作為管治技術，還在生活政治層面涉及什麼值得注意的管治思維和相應的空間部署與實踐。